

真正寻找自己的“现代”之路 ——从历史平台对中国报告文学写作的回望

邢爱书

(山西长治教育学院中文系, 山西长治, 046011)

摘要:百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现代性的追寻史。中国报告文学文体从其言说对象及其文体面貌中所折射出来的内涵意蕴,都传达出对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深度整合与互动,凸显中国报告文学文体的前沿性,这体现于形象启蒙与内涵构筑、民族救亡与国家图存两大主题中对现代性的追寻,以及对与悖逆现代性主旨的“野蛮”的追逐、“灰色”社会风尚、二元结构失衡等社会症状的反思与批判。由此,报告文学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上引领时代精神气质的主流文体,成为名符其实的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时代文体”。

关键词:报告文学;现代性;终极关怀

中图分类号:G62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5)01-0092-05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实质上是一部建构独立、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奋斗史,贯穿其中的精神支柱与推动力即现代性。因此,百年中国历史也就是一部现代性的追寻史。现代性既是时间概念,更是某种气质、精神或者态度的代名词,确切地说,它是一种以现代人类的终极关怀为目的包含以人的主体自由为核心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等层面的理性原则与精神。作为现代中国文化表征之一的报告文学不仅从文体上基本实现由附庸到独立的嬗变,更在其内涵意蕴上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引领时代气质的主流文体。

一、中国报告文学——对“现代性”的渴望与追求

中国报告文学创作主体通过文本对现代性的追寻具体表现于形象启蒙与内涵构筑、民族救亡与国家图存两大主题之中。启蒙与建筑,主要指报告文学文体通过其叙说对象所传达的对现代性的主要代表——西方现代文明的褒扬与推崇,以及在批判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与现代性相悖离因素中显示出的对构建符合现代性原则的制度与文化的渴望与追求。这正如毛泽东曾经做过的精辟论述。他说:

“我讲了一个‘古今中外法’,就是:屁股坐在中国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又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1]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褒扬与推崇,多显现于中国报告文学中那些以域外,尤其是欧美、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等新兴社会主义国家为描述对象的文本里。如果说,在描述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工业文明的同时,又对其政治制度、社会问题与经济弊端进行或马克思主义或以中国传统思想为宗旨的批评的话,那么,对苏联这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褒扬就成为对现代性追寻的一个特例。邹韬奋在《萍踪寄语三集》中对苏联的经济、教育、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风貌等做出全方位的描述,最后落实到这样一个认识的平台:

观察苏联的人们,要明白苏联的新社会不是“乌托邦”,是从现实中做出发点而英勇斗争出来的;是一万万六千五百万的大众靠着自己的奋斗迈进,解除了压迫和剥削的锁链,铲除了剥削人的制度,根据他们所信仰的根本原则,继续向着自由平等的人的生活大道走。

这里所谓“自由平等的人的生活”,与我们理解

收稿日期:2004-05-10

作者简介:邢爱书(1954-),男,山西长治人,山西长治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训诂学,古代文论,写作学。

的现代性内涵有着内在的一致。尽管在今天看来,对苏联和欧美工业国家的这种认识还存在历史的局限,但从当时报告文学文本显示的倾向上看,却是十分真实而真诚的。我们不妨将之视为报告文学创作主体通过其文本对受众进行的一种有关在传统、封闭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如何构建一个类似苏联那样代表人类新制度的全新社会的形象启蒙。

在批判反思与现代性相悖逆的中国传统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同时,显示出对构建符合现代性原则的制度与文化渴求,是启蒙与建构主题的另一方面。这在经历着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文化转型的20世纪80~90年代的报告文学文本中得到了最为生动的体现。它突出表现在三个以实现“主体自由”为终极目标的层面:

其一,追求对个人精神自由与自我价值的确定与实现,这集中于以婚姻恋爱和个人隐私等私人空间为主要对象的言说中。前者以《阴阳大裂变》《不结浆果的黄土地》《爱河横流》《人生环行道》《荒滩桑小做蚕难》等为代表。这些文本多以20世纪末期的中国农民与城镇普通市民为描述对象,对沿袭千年的包办买卖婚姻、畸形性关系婚姻所导致的家庭解体、人性扭曲、精神压抑的状况,表达出深入的反思与批判。麦天枢在《爱河横流》中描述了一个在中国当代农村普遍存在的男女为爱情私奔的现象。在作家看来,“男女私奔”现象是基于爱与个性的现代婚姻观念与基于秩序与伦理的传统婚恋观念发生巨大冲突的产物,是超功利性与功利性激烈搏斗的悲剧结局。作家有感于当代中国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巨大的落差,已明显地感觉到“社会越发展,生活越富足,精神的需要便越高,这中间,爱、精神世界的开放与愉悦,便不能不成为一个社会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以此表达对社会中个体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差异的宽容和对人们追求精神自由与自我价值实现的充分肯定。

其二,呼吁建立一个与世界经济全球化接轨的、开放、灵活、充满生机的经济体制,以及符合世界潮流的民主公正的政治制度。诸多报告文学文本捕捉并显示了这一极富前沿性的话题。其中,陈祖芬在80年代中期发表的《挑战与机会》系列报告文学尤为突出。这个由11篇文本组合的系列,以恢弘的气势、大胆的揭露和理性的思考,在全方位、多层面地描述转型期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转换性阵痛的同时,重点对束缚人创造力、积极性与潜能的经济体制做出反思与批判,热切呼唤以人

为本的现代企业文化理念的诞生。

其三,倡导确立以人为本、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法制观念与意识,这正是社会文化转型中由传统伦理社会转向现代法理社会的一种诉求。卢跃刚的《以人民的名义》《讨个“说法”》《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大国寡民》等是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在这些文本中,作家形象地描述了传统伦理社会向现代法理社会转型的艰辛。在《以人民的名义》以及续篇《讨个“说法”》中,作家再现了一起非法拘禁人民代表的案件。这里包含着作家的一种近乎沉重的看法,即传统的重人伦轻法治观念根深蒂固,向现代法理社会的转型尚有更为艰难的道路要走。

以实现“主体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性因素,在上述三个层面渐次展开,不论报告文学的创作主体是否对此有意识或无意识,其文本所显示的信息已确凿无疑,这也恰好说明时代的精神倾向以无所不在的方式影响着文本的叙说以及书写的内涵的面貌。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是,报告文学作家们大都不谋而合地将文本内涵构筑成一个二元对立的模式,即批判、反思与启蒙、建构的两两相对,在对传统构件进行反思与扬弃的同时,希求对现代性构件的建设。事实上,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文化转型内在机制的国度而言,批判、反思与启蒙、建构的对象有时并非那么截然对立,它们似乎是在犬牙交错中生长。因为中华文化作为“外发次生型”现代化类型有其别于欧洲本土的特殊性,这诚如一位论者所言:“中华文化现代转型的激变性和复杂性,首先表现在这种转型是在西方文化强行侵入,打断中华文化自身的过程的情形下发生的。正如向人体移植器官必将引起排异反应一样,西方现代文化的楔入,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激荡之深切是空前的。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不仅要完成文化的时代性跃进,还要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保持与变异这一组矛盾。”^[12]这种矛盾在报告文学文本中表达得并不十分充分,也可以说,多数报告文学创作主体在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潜移默化的作用下,至少是未能充分展示传统与现代、批判反思与启蒙建构等关系的复杂性、多变性。这影响报告文学文体对现实把握的深度。

中国报告文学文体对现代性的追寻还体现在救亡与图存这一主题中。这充分体现于30~40年代的报告文学文本。在《卢沟桥畔》《八百壮士》《第七连》《我有右胳膊就行》《杨可中》《江南抗战之春》《英雄的十月》《挺进大别山》等文本中,反抗外族侵略、为保卫自己国家的民族统一、完整和独立性,不

愿沦为殖民、附庸国的民族自尊心,以及在民族内部的决战中,反专制、封建、独裁与渴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意识十分浓郁。这些大多数以人物或战争场面构筑的文本,其内在的动力可以集中到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守护与重建的自觉意识上来。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以诗一般的语言强调延安的空气是“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因为这里不但有着共产党,而且有着崇高的原则,伟大的思想,大家共同奔向的目标。这里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的理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必然到来的信心。赵超构在《毛泽东先生访问记》中则以一个民主人士的眼光描绘毛泽东作为共产党领袖善于融会传统与现代、勇于突破陈规与教条的卓越才能。其意在于说明以共产党和毛泽东为象征的中国新兴力量,精通中国传统,善于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最为理想的选择,代表着在更为深入的层面上对现代性所规约的“主体的自由”的追求与梦想。

由上可见,在与以现代性追寻为轴心的时代精神的深度契合中,中国报告文学文体的前沿性比较充分地显现出来。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特定文化传统中的文化存在,报告文学文体与其它文学文体一样。“它在整个文化中并非被动地为某种力量所左右,而是积极参与整个文化大系统的运转。”^[3]在这种积极参与而非被动呈现的过程中,报告文学文体对以现代性为轴心的时代精神的契合就不仅表现为单纯的追寻,它还在另一层面上表达出对现代性的反思。这种反思最终成为报告文学文体规范中文化批判性的核心内涵之一。

二、中国报告文学——以现代人类的终极关怀为目的

中国报告文学对现代性的反思,多以现代人类的终极关怀即实现其主体自由为目的。因此,它特别关注和警醒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与此相悖离的缺失。80~90年代,报告文学文体呈现出对社会文化全面转型中所出现的危机与隐忧,乃至不可逆转的因素予以深入的揭示与反思。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揭示与反思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如两极思维模式主控下的绝对化趋势、国家意识形态监控下的政党意识、狂飙突进似的

浮躁情绪等等,但作家们在从发掘问题到分析问题再到希求以政治权利解决问题的写作模式中,基本坚守的是以批判和反思的姿态,探求与弘扬人的主体自由这一现代性的核心内涵。这主要集中于对生态危机、腐败以及弱势群体等三类代表性社会症状的描述上。

在日益高涨的以工业化、城市化为特征的现代化浪潮中,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自然生态面临巨大破坏,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題,成为报告文学文体所特别关注的对象。从沙青较早反映北京水危机的《北京失去平衡》到陈桂棣描述淮河流域污染的《淮河的警告》,以及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马役军的《黄土地黑土地》、何建明的《共和国告急》等,一个揭示与反思水、陆、山、林等人类栖息地面临严重危机的全景式图画就展现在人们面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展现本身还呈现出报告文学作家对描述对象认识的逐步深化与反思的思路逐渐廓清的过程。这表明有远见、善思考的报告文学作家已经开始了对自身曾沉溺于以工业化为主体的现代化狂欢书写的拷问与检讨。徐刚自80年代末写作《伐木者,醒来!》之后,连续发表了《沉沦的国土》《中国:另一种危机》《中国风沙线》《最后的疆界》《绿色宣言》等。在《伐木者,醒来!》中,作者对以工业化为主导、以毁林为代价的现代化进程抱以质疑,他写道:

这样一种近于毁灭森林资源同时也是毁灭我们自己毁灭我们子孙的速度,因为城市膨胀、人口增加、乡镇企业的不合理布局和土地——尤其是耕地面积的难以控制的减少,以及玩忽职守的官僚主义对毁林、生态破坏的无知及漠不关心,总之穷疯了的中国人对财富和物质文明的野蛮的追逐,使这样的毁灭还在加速之中^[4]!

这里,我们不难体味出创作主体的情感倾向,既对工业化的负面效应以及人性中急剧膨胀的私欲进行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它告诉我们,以理性为基本原则、以人的主体自由为核心建构的现代性,决不能因为人类非理性的思维与行为方式而改变其美好的初衷。

与探讨生态危机的文本相对应的是,大量报告文学文本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腐败现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揭示,直逼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对“人的主体自由”理念的曲解而造成的规约失范和人性迷失。一部以官吏腐败为描述重点的文本——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则显示出对人的欲望及道德约束、制度规范等等问题的深入思考。这部作品的独

特之处在于,它以最经济的笔墨写事件过程,而以最浓重的色彩书写人物的心态、理念与情感,好似一位心理医生,通过事件的外壳层层深入至人物的内心,以此探讨人物是如何在权、钱、欲这些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遭遇的问题面前迷失心灵家园,成为没有家园的灵魂的。作者在文中的一段非叙事性话语颇有深意——

但是,人的心中有一个幽灵,它的名字叫:欲望。欲望,作为一个人心灵深处的原始动力,它并不是一个魔鬼。……欲望是水,合理地宣泄,她像一个风情万种的少妇,用乳汁哺育着人类的繁衍和发展;欲望是兽,闭塞理智地冲动,它就会变成一个危害社会、表现人性丑恶的魔鬼。控制欲望,靠的是文明人的理智和社会制约机制。但是欲望并非理性的冲动,几乎每时每刻在与人的理智进行着搏斗,一旦人的理性和社会制约机制不能控制欲望,欲望就会变成洪水猛兽,破坏人的美好愿望,破坏社会的公平机制,破坏党的事业发展,也破坏一个家庭和一个人平静安宁的生活^[5]。

这里,文本所表露的含义已十分明确,那就是欲望的放纵与节制,成为现代文明人类理性与非理性的分水岭。而只有遵循理性及其社会制约机制,人类主体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不仅仅是欲望,本能层次上的自由),以理性原则为核心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机制才能得以实现。在此,文本由对转型期人的理性失落与社会制约机制松弛的反思,达到了对现代性本义的回归。

在现代化进程中,公平与效益常常是困扰人类、特别是当代中国的一个两难问题,它的背后隐含着现代性的坚守与失守问题。当今,效益优先原则的突显使社会阶层的重新排列组合成为可能,这使社会弱势群体与社会弱势群体成为不同文学样式的关注对象。报告文学因其本能的“左翼的”“在野的”“批判的”文本特性,使其不能不关注那些基本权利受到损害的社会弱势群体。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卢跃刚的《在底层》《乡村八记》,何建明的《落泪是金》《恐惧无爱》以及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中国乡村教师》等即为其中的突出代表。这些文本在展示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贫困大学生、失学儿童和山区中小学教师等弱势群体之心态与生态的同时,已超越了居高临下式的怜悯与同情,而转向了呼吁关注、维护权益的思维路径。对弱势群体的描述,从更深一个层次上讲,即是检讨社会发展过程中理性精神与公正原则的体现或缺

失。卢跃刚对观察中国问题的方法,即“真中国问题”与“假中国问题”的叙说,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书写这类问题的作家们的理念与倾向,他认为:

这个问题提得过于极端,却发人深省。我理解它的含义,中国社会至今仍然是农村和城市二元结构,按阶层划分,又有富裕与贫困、上层与底层之分,如果我们的眼睛总是盯着城市、富裕、上层,无论是建构理论学说,还是用文学或者其它方式描述中国问题,都可能一叶障目,陷入“假问题”的泥沼。……我只是发现,研究中国问题,如果没有底层、农村、贫困的参照系,没有这些层面——一个涉及十亿左右人口的层面的深切观察和体验,很难把握中国社会的走向^[6]。

尽管卢跃刚的二元思维论省略了诸多中间状态的结构与阶层,但他的认识无疑是明白晓畅和深刻敏锐的。何建明的《落泪是金》和《恐惧无爱》则力图从贫困大学生与遗弃青少年这两类特殊人群来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现状。大学生无力支付学费的窘况实际正是家庭贫困现实的折射。在文中,作者既展示出莘莘学子们与贫困命运抗争、奋力自救的令人落泪的艰辛历程,又振臂呼吁对这一社会转型期所日渐突出的大学生贫困问题予以全社会的关注和援助。“因为解救知识,便是解救了人类自己。解救有知识的年轻人,便是让所有被解救的人们获得明天最根本和最彻底的幸福与光明!”^[7]而每一个公民受教育权利的获得正是一个理性、公正、公平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必由之路、应有之义。在对“另类孩子”即因种种原因遭致父母遗弃的青少年的描述中,作者批判了在进入极度追求自我与个人化生活、生存方式的物欲世界里,人类遗弃亲情、放逐家庭的惟利主义和惟欲主义的反人性、反理性时尚。在“拯救父母、拯救亲情”的理念之下,作者道出了复归现代性宗旨的拳拳之心:

是的,人类在万象更新、一日千里地变迁中,我们正在扬弃许多旧的和落后的东西,但无论社会发展和进步到什么程度,惟有一样东西是万不能扬弃和丧失的,那就是血肉亲情,其道理同样非常简单,它是人类生存和本体发展的本体属性。所谓本体属性,就是说假如没有了这样的一些东西,人就不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人”了^[8]。

在此,作者解析了所谓的“本体属性”,与其说是人的自然属性,倒不如将之理解成人类遵从理性原则发展自身的本质更为恰当。应该说,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都在通过他们的文本述说对社会弱势群体

的人性关怀和人生关怀,以及对社会公正和效益优先原则辩证关系的严肃思考。其根本目的是,以现代性反思的姿态考察现代化过程中理性原则的扭曲或丧失,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综上所述,以对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症状的反思与批判为重点,报告文学对背离现代性“主体的自由”之核心的现象描述与理性分析是颇有建树的。它比较出色地体现出现代性内省的文体特质。而无论是对现代性的追寻或反思,中国报告文学文体通过其言说对象而显现其内蕴与时代精神相契合与互动的特性已昭示于世。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和辩证唯物主义者,时代造就了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呼应了时代。它从文体的附庸腾跃而起,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上引领时代精神气质的主流文体之一,成为名符其实的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时代文体”。

参考文献:

- [1] 刘汉民. 传统文化·现代性·教育[N]. 光明日报, 1994-06-20(8).
- [2] 冯天瑜.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序.
- [3]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33-34.
- [4] 徐刚. 伐木者, 醒来! [A]. 最后的疆界[C]. 北京: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8. 5.
- [5] 杨黎光. 没有家园的灵魂[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 93-94.
- [6] 卢跃刚. 在底层[M].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0. 6.
- [7] 何建明. 落泪是金[J]. 中国作家, 1998, (6): 86-134.
- [8] 何建明. 恐惧无爱[A]. 2001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C]. 北京: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2. 56.

Looking for the “modern” road ——Introspection to the Chinese reportage

XING Aí sh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Shanxi Changzhi Educational College , Changzhi 046011 ,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is the one in pursuit of modernity. The deeper meaning of Chinese Reportage reflected both in the narrating object and the appearance of style indicates the high-level conformity and interaction of spirit of age whose core is exactly modernity. It also shows the advancement of the style. All the implications are embodied in the pursuit of modernity between the themes—the enlightenment of imag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eaning, the independence of peop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nd also embodied in the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of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the pursuit of “savage”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modernity, the “gray” social fashion, and the unbalance of two element structure, etc. So, the reportage develops into one of the mainstream styles in the literary circle in China, which can be called “time style” considering it is the embodiment of spirit of age.

Key words: reportage; modernity; ultimate concern

[编辑: 苏慧]